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35周年成果巡礼

探索与创新

主 编 赵心愚 余仕麟

民族学 · 人类学： 追述与反思

副主编 李克建



四川大学出版社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35周年成果巡礼

探索与创新

主 编 赵心愚 余仕麟

民族学 · 人类学： 追述与反思

副主编 李克建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舒 星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学·人类学:追述与反思 / 赵心愚, 余仕麟主
编.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614-7914-8

I. ①民… II. ①赵… ②余… III. ①民族学—文集
②人类学—文集 IV. ①C95-53②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172618 号

书名 民族学·人类学:追述与反思

主 编 赵心愚 余仕麟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914-8
印 刷 四川和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6.5
字 数 43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 序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社科版)创刊于1979年7月,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应运而生的宁馨儿。35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雨露,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和强有力的支持下,学报社科版通过不断的改革探索和锐意创新,刊物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逐渐扩大,近20年来已经陆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还被评为“全国民族地区学报名刊”“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名刊”等,并且在CSSCI期刊的评选中连续数届名列全国民族学与文化学类学术期刊前茅。“三十而立”,35岁的学报社科版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回想35年前创刊之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正从“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恢复过来的西南民族学院(2003年6月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改由国家民委和四川省双重领导(以国家民委为主),并被列为“六五”期间重点建设院校,学校迎来了自1951年建校以来的第二次大发展。1979年3月,学校《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的意见》颁布实施后,更为把工作重心从思想、工作、制度上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做了一系列准备,为本刊的创办和发展营造了宽松有利的环境。自创刊以来,学校在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硬件设施、办公经费等方

面，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学校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大发展，进入了建校以来发展得最快、最好的黄金时期，办学规模迅猛扩大，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迅猛提升，学校从各方面对学报的支持自然更大，要求也更高。这些年来，学报社科版和理科版（1975年创刊）努力抓住这种大好机遇改革创新，加快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学报社科版，自“十五”以来更加明确了特色化发展战略，立足学校的学科特色和地处大西南的地域优势努力做大做强“民族学·人类学”板块，着重打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文化”“藏彝走廊”“灾难人类学”等栏目和专题，逐渐凝练了自身特色和品牌优势；同时锐意改革，不断创新，较早在全国学报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尝试，并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科学管理，一次又一次取得较大的突破，在海内外学术界尤其是民族学界产生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成了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最重要的“三核心”（CSSCI来源期刊、中心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头衔的重量级刊物，被誉为“民族学类学术期刊的一朵奇葩”。

作为综合性学术期刊，学报社科版开设有“民族学·人类学”“哲学·宗教”“法学”“经济·管理”“新闻传播”“语言文学”“政治”“历史”“教育”等基本栏目，创刊以来各个栏目所刊发的文章数以千计。在创刊35周年之际，学报编辑部以基本栏目为单位，从各个栏目历年所刊发的众多文章中各精选出四五十篇辑集成册，结成《民族学·人类学：追述与反思》《民族文化：发掘与弘扬》《哲学·宗教：智慧与超越》《法学：社会秩序如何构建》《经济·管理：效率与福利》《生态文明：利用与厚生》《文学：从文化启蒙到思想激荡》《传媒与文化产业：媒介时代前瞻》《政治·历史：守望与追求》《教育：百年树人》《信息分析与科学评价：学术影响力研究》等11个专题卷册，作为纪

念创刊 35 周年的“探索与创新”系列丛书，其目的有三：一是检视创刊 35 年来各个基本栏目的大体质量，二是反映我校学报社科版创刊 35 年来在推动我国学术进步和文化繁荣方面做出的努力，三是为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对我校学报办刊 35 年来的优秀文章进行“专业化”阅读提供方便。

为了从各个栏目数以千计的文章中遴选出相对较为优秀的四五十篇作品，丛书各卷册都遵循如下遴选标准：（1）名家名稿；（2）他引次数多的文章；（3）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高校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四大文摘转载的文章；（4）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社科成果奖的文章；（5）属于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成果等。在选编时，上述条件同时具备得越多者优先入选，而入选文章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一两条。在此前提下，丛书还同时考虑到各个年代和卷册内各个栏目板块以及文章主题的基本平衡，规定原则上一个作者的文章在一卷中最多只能选用一篇。这样，既尽可能照顾到更多的作者，又保证了每一篇入选文章都具有较高的质量。

21 世纪的今天，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层出不穷，全球化、数字化、国际化浪潮滚滚而来，势不可挡，高校学报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更为激烈的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面向海内外发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将再接再厉，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既要及时反映西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为促进西南民族大学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更要为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学术支撑，使其不仅在国内成为名刊，也能够面向世界，逐步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是为序。

目 录

民族理论与政策

- 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刘先照 (1)
- 费孝通民族学术思想述略 徐 平 (15)
- “民族”新证 金炳镐 (26)
- 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
——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 王希恩 (40)
- 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 ... 陈玉屏 (85)
- 民族理论政策热点问题的讨论与启示 刘世哲 (103)
- 从“民族”概念重构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探索
..... 来 仪 (119)

民族问题

发展失衡、预警与超越预警

- 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的思考 吕昭河 (134)
-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冲击与
影响 叶 江 徐步华 (153)
- 基于社区管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分析
及预防对策 张明善 李春杰 (169)
- 省际结合部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调查报告
..... 张 成 许宪隆 郭福亮 (178)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实证研究

..... 王银梅 李 龙 (190)

藏彝走廊

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

——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 石 硕 (203)

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 段 渝 (218)

任乃强先生对西康建省的贡献 任新建 (231)

“康巴学”的提出与学界的回响

——兼论构建“康巴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杜永彬 (250)

民族历史

明季《松潘边图》初探

——试证图中黑人、白人为两大部落群体 ... 陈宗祥 (271)

试论汉代“越嵩”的“越” 蒙 默 (289)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赵心愚 (295)

明清广西左右江地区土司的婚姻与策略 张江华 (306)

西汉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影响 李克建 (332)

论族别史研究与整体史观

——以西北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历史研究为中心

..... 陈文祥 (349)

人类学·西南研究

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李绍明 (359)

由族群到民族：中国西南历史经验 王明珂 (372)

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 王建民 (39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

..... 彭文斌 汤 芸 张 原 (425)

人类学·灾难研究

灾难的理论研究：自然、权力和文化

..... [美] 安东尼·奥立佛-史密斯 著

纳日碧力戈 译 彭文斌 校注 (444)

人类学灾难研究的面向与本土实践思考 … 庄孔韶 张庆宁 (472)

巨灾风险分担机制探讨

——兼论“5·12”汶川大地震“对口援建”模式

..... 杨正文 (497)

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刘先照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是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指南。民族理论总是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而向前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党制定了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团结中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在民主革命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指导民族工作获得重大成就，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拨正了历史的航向，恢复了被“文化大革命”所全盘否定的民族理论，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部分，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宝库，指导民族工作夺取了新的巨大的成就。

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对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民族理论方面的深化和发展，我们还总结得很不够，影响了我们更好地执行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弄清民族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对总结经验，认识过去，丰富民族理论体系，指导现实，为今后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更好地为四化建设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繁荣的事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这种深化和发展，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邓小平同志 1979 年 6 月 15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中说：“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54 页）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对新中国建立以后民族情况和民族关系进行总结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与这个理论相适应，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以后的 1980 年第一次提出了“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479 页）后来，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 8 页）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这些论述，明确了这样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我国各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在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结成的。就全国来说，这个时间应该是在 1960 年以后。第二，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重大问题，对深化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有重要意义。

我国各民族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提出来的，1957 年和 1958 年一些重要文章都讲到内蒙古、广西、宁夏等自治区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章明确指出，当时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极其巨大的影响。前引小平同志的那段论述，并不是对过去提法的简单恢复，而是有发展的，与 50 年代的这个理论在内容上、实质上都有不

同。这种不同之处，就在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形成的呢，还是在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条件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消灭剥削阶级是不是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条件之一？如果还存在剥削阶级，是否能够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1页）这就是说，我国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这种看法是符合当时中国实际的，是正确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可惜这个正确的理论很快就被否定。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夏季形势》和《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中，明确提出了我国存在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页）当然，这个理论成了中国当时理论上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总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自然受到影响，认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虽已形成，但还存在着剥削阶级。1959年建国十周年的重要纪念文章之一的《各族人民的伟大团结》中说道：“民主改革只是消灭了封建的、奴隶制的压迫制度，还没有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个体所有制。私有制度还是产生民族压迫、歧视和民族纠纷的社会根源。”（《十年民族工作成就》〔1949—1959〕第45页）到了1962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无所不在了。接着，于1963年错误批判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理论家李维汉同志，就把“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理论作为“修正主义”理论彻底否定

了。

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结成，是在各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这就包含消灭了剥削阶级的内容。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在政协开幕词讲话之前的两个多月，即1979年3月30日，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批判“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三中全会以来》〔上〕第92页）。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那么，我国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就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结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所以，小平同志讲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形成的。这就不同于50年代我们讲的存在着剥削阶级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观点，从而使这个理论能够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准确地、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的条件和时机。

这里，就涉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即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条件之一，包含不包含消灭剥削阶级？我认为，答复应当是肯定的，各民族必须是在消灭了剥削阶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才能结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必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就包含了消灭剥削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方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那种认为在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条件下，也可建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存在着剥削阶级，就存在着剥削阶级的生产方式，它在生产资料的占有、社会财富的分配、意识形态等领域中，都发挥着重要的、有些是决定性的影响，都

代表着剥削阶级的利益，又必然地反映到民族关系上来，在这种条件下，就不会建立起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与此密切相连，就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一个是，“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另一个是，为什么说是“基本上”，而不成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中央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说的是：“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这个“今天”，当然是指1980年形成文件之时。但是，我认为，这个时间不仅包括了1980年，还包括了1980年以前的一些年份。划分的标志，就是文件所指出的“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形成“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的条件。没有实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联系起来同时进行的），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资本家阶级、封建地主（牧主）阶级、封建农奴主阶级、奴隶主阶级，剥削阶级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各族劳动人民完全成为本民族的领导力量和决定性力量，才能使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说“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由于实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剥削阶级被消灭了，公有制建立起来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过去，但是，阶级斗争还将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这种阶级斗争有时还可能在民族问题上反映出来，影响民族之间的关系。所以，还不能说各族之间的关系完完全全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而“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比较科学地反映了这个实际状况。

（二）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9页）这段论述全面地、精辟地概括了新时期我国民族问题的内容，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做好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们党一贯重视做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1956年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党的八届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说：“正确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工作中一项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党史参考资料》〔八〕第331页～332页）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页）这些论述，都把解决民族问题提到了重要的地位。

前引耀邦同志的那段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党关于解决民族问题重要性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民族的团结、平等和共同繁荣，是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和党在民族问题上所要实现的目标。这段简练的论述，高度概括了丰富的内容，比以往的一些论述更为精练，更为深刻，更为科学。把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全局性的、关系祖国命运与全国各族人民长远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的高度，完全符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符合中国的国情。它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民族理论体系中

的一条基本理论，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问题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

——民族平等是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前提，只有废除民族压迫，才能实现民族平等。我国虽然已经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各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一律平等，但要在各个领域完全落实民族平等的各项政策，充分体现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还是长时期的任务。同时，我国现在还存在着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今后还将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要实现完全的、彻底的民族平等，还有待于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是长期的战略任务，与我们祖国将来的发展息息相关。

——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建设社会主义是各民族的共同目标，共同事业。只有各民族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努力奋斗，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几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民族团结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民族团结了，就会促进全局的安定团结，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与祖国的前途命运可谓关系极大。在今天建设四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各民族之间经济上的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日趋密切，日趋重要，无论资源、财力、人力，都需要互通有无，互相协作，取长补短，共同前进。民族团结了，彼此间互助合作事业就顺利，反之，就将受到削弱。所以，民族团结与当前和今后长远的经济建设息息相关，是经济建设赖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祖国发展繁荣的基础。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而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民族繁荣，才有中华民族的繁荣，才有伟大祖国的繁荣。我们党实施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大家共同富裕的政策，完全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各少数民族地区之

间，都可以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大家共同富裕，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各民族走向共同发展繁荣，是共产主义实现民族融合的基本条件，在共同发展繁荣的基础上，才能增加各民族在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上的共性，逐步发展民族融合的因素，最后实现民族融合。

可见，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共同繁荣，不仅与我们国家的统一、边防的巩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将来建设共产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它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这样精练的概括，提到这样高度，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理论的学说，在实践上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民族工作取得卓著成就，使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处于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三）关于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理论

1981年，中央书记处先后在讨论新疆、内蒙古的工作中，接着胡耀邦同志在和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负责人座谈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胡耀邦同志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汉族离开少数民族不行，少数民族离开汉族也不行。”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说的“两个离不开”。这一提法，比过去的一些提法更为精练、明确。它不仅为民族理论工作者，也为各民族广大群众乐于接受，易于表达而受到欢迎。

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1955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4页）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同志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单靠汉族。……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